

結構現實主義與中共大國外交格局

邱坤玄

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

摘 要

結構現實主義以國際權力分配的型態，作為分析國家對外行為的基礎。中共大國外交格局以建構不同形式的夥伴關係為工具，已經大為提昇了它在國際上的地位與影響力。但是當前國際政治的格局仍是美國一元下的歐盟、日本、俄羅斯與中共的多極局面，中共的國力仍然不足以改變此種格局，而它的大國外交所面臨的機會與挑戰，也必須在此格局下尋求解答。

關鍵詞：結構現實主義、中共大國外交、夥伴關係

壹、前 言

一九九七年九月中共中央總書記江澤民在「十五大」報告中，提出了國際形勢總體上繼續趨向緩和的評估，他同時指出：「多極化趨勢在全球或地區範圍內，在政治、經濟等領域都有新的發展，世界上各種力量出現新的分化和組合，大國之間的關係經歷著重大而又深刻的調整。」¹嗣後，大國關係的調整成為中共外交論述中經常出現的議題，而大國外交格局隱然成為二十一世紀中共全球戰略的主要構想。在實際行動上，一九九七年四月江澤民訪問俄羅斯，和俄羅斯總統葉爾欽（Boris Yeltsin）就世界多極化和建立國際新秩序發表聯合聲明，重申共同建設「面向二十一世紀戰略協作夥伴關係」；同年五月法國總統席哈克（Jacques Chirac）訪問北京，兩國宣佈建立「面向二十一世紀的全面夥伴關係」；十月下旬，江澤民訪

¹ 「江澤民在中共十五大的報告」，文匯報（香港），1997年9月13日，版A10。

問美國並發表聯合聲明，共同致力於建立「建設性戰略夥伴關係」。一九九八年四月，中共總理朱鎔基與歐盟領導人舉行首次會晤，會後發表了「中國—歐盟領導人會晤聯合聲明」，表示要建立面向二十一世紀的健康、穩定的建設性夥伴關係和領導人年度會晤機制；同年六月美國總統柯林頓（Bill Clinton）訪問中國大陸，雙方一致同意進一步改善兩國關係，加強兩國在各個領域的合作；十一月底，江澤民作為中共最高領導人在歷史上首次訪問日本，雙方主張消除發展兩國關係的障礙，建立面向二十一世紀，致力於「和平與發展的友好合作夥伴關係」。至此，中共已和全世界各大國建立了不同形式的夥伴關係，大為提升了中共的國際地位與影響力。

國際政治的結構現實主義（structural realism，或稱新現實主義，neo-realism）主張國際體系中大國力量分配的狀況，決定了國際政治結構的性質，因而提供體系內各國行動的機會與限制，中共的大國外交與此立論似有相同之處，本文嘗試探討此理論對中共大國外交的適用性，同時據此預測中共大國外交的機遇與挑戰。

貳、結構現實主義

現實主義是研究國際政治的主流，學界通常將其區分為古典現實主義（classical realism）與結構現實主義兩大學派。古典現實主義的基本假設有三。第一、國家中心。國家是國際政治最重要的角色與研究對象，其他角色如個人或跨國組織，則居於次要地位。第二、理性決策。國際政治的研究建立在國家有如一個理性決策者的假設之上。即使在狀況不定、資訊不足的情況下，國家仍會審慎地評估各種選擇的成本，以追求最佳的利益。第三、權力至上。國家以追求權力最大化為目標，國際社會的本質是無政府狀態，缺乏中央權威強制協議的執行以及保證安全，因此國家必須依靠自己力量維護其利益。²

² 古典現實主義的代表著作有 Hans J. Morgenthau, *Politics Among Nations: the Struggle for Power and Peace* (New York: Knopf, 1948 and later editions); E. H. Carr, *The Twenty Years' Crisis: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London: Macmillan, 1939); Henry Kissinger, *A World Restored: Castlereagh, Metternich, and the Problems of Peace, 1812-1822*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57); Martin Wight, *Power Politics* (Harmondsworth, Great Britain: Penguin, 1978); and Arnold Wolfers, *Discord and Collaboration: Essays o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Baltimore, Md.: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62).

。一九
發表了
紀的健
總統柯
關係，
人在歷
二十一
全世
影響

neo-
的性
論似
社預

義
設
也
力

結構現實主義以肯尼士·華爾茲（Kenneth N. Waltz）為代表，³ 華氏利用國際體系和權力分配的架構，將古典現實主義國家、權力和利益的中心概念納入其中，並藉著國際權力分配的型態，作為分析國家對外行為的基礎。結構現實主義雖然與古典現實主義同樣重視權力，但是更強調權力的工具性，用以達到國家安全的目標。國際體系的基本要素包含系統的基本單元與系統本身的結構。

首先，國際政治結構理論從國際層次，而不是從國家或個人層次探討影響國際行為的因素。國際政治結構理論有如經濟學上的市場理論，它揭示出市場內的公司市場機制下，如何以特定方式做出特定的反應。國際體系內的構成份子也經由此社會化的過程，對不同的國際結構做出不同的反應；他們的行為在此情況下就有一定的相似性與可預測性，因此分析各單元在它們所屬系統中的地位，而不是其內部的性質，才能了解國際政治行為的本質。在國際層次上發揮力量的是國家，它們之間的差別不在其執行的功能，而在於其力量的大小。國際政治的結構理論與國際政治的歷史一樣，主要是研究各個時代的大國問題，系統中所有國家的命運，受大國行動的影響要比受小國的影響大得多，而中小國家的選擇，則需要把大部分的注意力集中在大國、特別是影響最大的國家。所謂大國的衡量標準是人口的多少和領土的大小、資源的儲量、經濟實力、軍事實力、政治穩定性和能力。

其次是系統的結構，國際結構由無政府狀態，國家與權力的分配所組成，無政府狀態與國家是運作的基本形式，屬於不變項，對於國際結構不產生實質的影響，權力的分配才是真正決定國際結構的重要變項，不同的國際權力分配型態產生不同的國際結構，而不同的國際結構和國家所處的地位，會決定國家對外行為。結構與單元之間互為影響，從此互動過程中分析國家對外行為的原因與後果。在國家所處地位之時，古典現實主義把權力視為國家追求的主要目標，結構現實主義則把權力當作是可能使用的手段，明智的政治家維持擁有適度的權力，國家最終的目標不是權力，而是安全。這是新現實主義與現實主義最重大的差異。

華氏從結構內權力分配的型態分析，認為兩極的國際政治結構是最好

³ Kenneth N.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Reading, Mass.: Addison-Wesley, 1979); *Man the State, and War: A Theoretical Analysi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59); "Reflections on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 Response to My Critics*," in Robert Keohane, ed., *Neorealism and Its Critic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6), pp. 322-345.

與最穩定的，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形成的兩極格局便是這種結構的體現。即使在蘇聯超強瓦解，國際形勢發生重大變化之後，華氏仍然認為國際政治的基本形勢並未產生根本的改變。⁵首先，結構現實主義對蘇聯的瓦解仍具有分析的能力，華氏指出八〇年代之後，美蘇兩大超強國力都有相對下降的趨勢，美國比較成功地維護了優勢的地位，前蘇聯則企圖改革以適應國際結構新的要求，但並未成功。華氏認為前蘇聯的失敗，是因為結構內單元的變化引起結構本身的變化，而單元的變化部份也源於結構壓力的結果。

其次，蘇聯經濟上的失敗，並未完全改變國際政治、特別是國際安全的兩極基本結構。一方面，崛起的大國並不足以取代前蘇聯的地位直接與美國抗衡，它們是影響國際結構穩定性的因素，但不是根本改變結構的力量；另一方面，俄羅斯仍然是全世界第二大軍事強國，在國際軍事安全領域仍然具有重大的影響力。

第三、那些企圖進入強權之林的大國，將仍然受到權力平衡規律的支配。這些迅速崛起的強國能否成為自我期許的世界一流大國，不僅取決於比他們強大的主要國家態度與反應，而且也受到比他們弱小的許多國家的牽制。

最後，新自由主義認為民主體制較易形成和平的論述，⁶也無法在實際政治中獲得驗證，現代國際戰爭或國際和平，最終仍然取決於國際政治中的大國關係體系，尤其是國際安全的基本結構。

現實主義有古典與結構之分，而在結構現實主義當中也存在分歧的論述。第一、對於國際政治結構的性質，論者有侵略性與防禦性之別。⁷侵略性理論認為國際體系結構是形成衝突與侵略的根源，安全不可多得，使國際競爭激烈，戰爭可能性升高，因此理性的國家，會採取具有攻擊性的戰略以尋求安全。⁸另一派學者則採取比較樂觀的看法，認為國際體系並

⁴ 參見 Kenneth N.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Ch. 8 & Ch. 9.

⁵ Kenneth N. Waltz, "The Emerging Structure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8, No. 2 (Fall 1993), pp. 44-79.

⁶ 有關新自由主義的論述請參見鄭端耀「國際關係『新自由制度主義』理論之評析」，*問題與研究*，第36卷，第12期，民國86年12月，頁1-22。

⁷ 參見 Jack Snyder, *Myths of Empire: Domestic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Ambition*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1991), pp. 11-12，但此種分類是否會被廣泛使用，仍有待觀察。

⁸ 如 John J. Mearsheimer, "Back to the Future: Instability in Europe After 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5, No. 3 (Summer 1990), pp. 5-55.

不必然引起衝突與戰爭，了解國際政治結構的本質，就能充分掌握安全的機會。因此國家應採取防禦性戰略，才是維持安全的最佳途徑。⁹ 第二類的爭論重點在於影響國際行爲的因素，華爾茲爲代表的學者主張權力分配情況是影響國家行爲的最主要因素，兩極的權力分配方式最能維持世局的和平與穩定。另一派學者則認爲威脅的來源與程度，才是國際與國家行爲的決定因素，¹⁰ 國家爲因應威脅而做出不同的反應。威脅的程度不僅要觀察威脅來源的綜合權力，更會受到地理環境、攻擊力量與意願的影響。

叁、大國權力分配的型態

中共對冷戰後國際格局的評估，著重在大國權力的重新排列與組合，這與結構現實主義的觀點相似。冷戰後中共就提出多極化的概念，鄧小平在評估蘇聯的變局時，曾經提出以下的看法：「美蘇壟斷一切的情況正在變化。世界格局將來是三極也好，四極也好，五極也好，蘇聯總還是多極中的一個，不管它怎麼削弱，甚至有幾個加盟共和國退出去。所謂多極，中國算一極。中國不要貶低自己，怎麼樣也算一極。」¹¹ 這裡反應出對中共的自我期許，但是如何達成一極？何謂多極化？仍未有具體的內涵。

「十四大」的政治報告中，對於兩極化的著墨也不多，只有簡單提到「兩極格局已經終結，各種力量重新分化組合，世界正朝向多極化方向發展。新格局的形成將是長期的、複雜的過程。」¹² 在此，中共強調格局的發展與過渡性，世界性的大戰爭可以避免，但是地區性的衝突仍會發生。中共認爲蘇聯解體，二次大戰後支配國際關係四十多年的兩極格局基本瓦解，而且它又是在沒有發生世界大戰的情況下出現的，因此在朝向多極化方向發展的過程中，必定會有一段鬥爭與妥協的過渡時期。在此期間因爲東西和解，世界可以爭取到一個較長時期的和平國際環境。但中共同時認爲世界各種矛盾在深入發展，如民族、領土與宗教爭端，結果造成衝突與

⁹ 參見 Charles L. Glaser, "Realists as Optimist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9, No. 3 (Winter 1994 / 95); Stephen Van Evera, "Primed for Peace: Europe After 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5, No. 3 (Winter 1990/91), pp. 7-57.

¹⁰ Stephen Walt, *The Origins of Alliance*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7), especially pp. 263-266.

¹¹ 鄧小平，「國際形勢和經濟問題」，鄧小平文選（第三卷），頁 353。

¹²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十四大以來重要文件選編（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頁 34。

局部戰爭。

一九九七年四月江澤民訪問俄國，並簽署了「關於世界多極化和建立國際新秩序」的聯合聲明，雙方決心將本著夥伴關係的精神，推動世界多極化的發展和國際新秩序的建立，要求建立新的具有普遍意義的安全觀，摒棄冷戰思維和集團政治，反對以武力或武力威脅來解決國際間的分歧，主張以對話協商促進建立相互了解和信任，通過雙邊、多邊協調合作尋求和平與安全。¹³ 在此中共已從過去的主觀願望，進展到積極「推動」兩極化的發展。到了同年九月的「十五大」政治報告，則強調多極化對穩定世局的貢獻：「各種區域性、洲際性的合作組織空前活躍。廣大發展中國家的總體實力在增強。多極化趨勢發展有利於世界的和平、穩定與繁榮。」¹⁴

一九九八年七月中共國務院發表的「中國的國防」，對於多極化的發展再增加了夥伴關係的因素，「各種夥伴關係朝機制化方向發展，各國獨立自主、聯合自強、協調發展的意識正在加強。發展中國家總體實力增強，正在成爲國際舞台上的一支重要力量。多極化趨勢和經濟全球化的持續發展，使國與國之間的相互依存和制約進一步加深，也有助於世界的和平、穩定與繁榮。維護世界和平的因素正在不斷增長。」¹⁵

從以上的官方文件中，我們可以提出以下幾點觀察。第一、中共具有強烈的主觀願望成爲國際政治中的一極。依據中共學者的評估，以綜合國力而言，美國仍是第一；從軍事上看，美、俄仍然擁有經過裁減後的絕大部份核武；在政治、經濟上則出現美、俄、中共、日與歐盟五個力量中心。¹⁶ 最近中共學者經常引用國外經濟專家的「購買力平價法」以及從中共經濟持續成長的速度，預測到了公元二〇二〇年，中共將成爲僅次於美國的世界第二大經濟國家。¹⁷ 但是中共同時強調自己仍然是個開發中國家，以免負擔更多的國際義務，顯然有違其大國意願。因此，中共對於自己大國的定位仍未清楚。

¹³ 聯合報，民國 86 年 4 月 24 日，版 9。

¹⁴ 「江澤民在中共十五大的報告」，文匯報（香港），1997 年 9 月 13 日，版 A10。

¹⁵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中國的國防」，人民日報，1998 年 7 月 28 日，版 1。

¹⁶ 參見杜攻主編，轉換中的世界格局（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92 年），頁 7；沈驥如，中國不當「不先生」（北京：今日中國出版社，1998 年），頁 75-77。

¹⁷ 如李忠誠主編，跨世紀的世界政治（北京：時事出版社，1998 年），頁 22；俞正梁等著，大國戰略研究（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1998 年），頁 318-319；閻學通等著，中國崛起：國際環境評估（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 年），頁 50-53。

第二、中共顯然主張多極化的國際格局，比兩極化更有助於世界的和平、穩定與繁榮。其主要目的是要打破美國獨霸的局面，因為中共認為「多極化世界格局的形成，有利於實現主要大國間的力量平衡，有利於防止一兩個大國操縱國際事務，因而有利於制止霸權主義。由於每一個『極』都反應一類國家的利益，因此，多極合作或大國合作，體現了一種民主的、協商的精神，是實現國際經濟、政治新秩序的一個必經階段。因此，中國支持多極化的進程。」¹⁸

第三、中共對於多極化的格局，由原來是力求適應多極化的趨勢，現在則是積極促進多極化的發展。過去談多極化的時候，總是說世界向多極化的方向發展，現在越來越強調多極化應該得到發展，其中最突出的就是一九九七年四月中俄關於世界多極化的聯合聲明。

第四、夥伴戰略是促成多極化的主要方式。在朝向多極化發展的世界中，中共主張傳統的權力平衡，雖然可以改變有關國家間的權力對比，卻不能改變有關國家的外交政策意圖或者利益衝突的現實。而夥伴外交則假定，日益加深的相互依存，包括兩國間的相互依存和全球範圍的相互依存，使國家之間共同利益多於衝突利益。¹⁹

基於這種假定，夥伴外交試圖發展和其他國家普遍的合作關係，來推進本國的對外政策目標。夥伴策略不否認夥伴國之間會經常出現矛盾。不過，這些矛盾將不涉及兩國核心利益，其產生的副作用可以得到控制，而不至於影響到兩國在主要問題上的合作關係。

對中共而言，一種全面的夥伴關係將從根本上消除對中國的安全威脅。在中國的國家統一問題上，和美國及其他主要國家間的夥伴關係，可以防止這些國家鼓勵台灣島內的獨立勢力。即使建立了夥伴關係，這一關係的維持也需要夥伴國之間保持某種程度的力量平衡，實力的不對稱發展將動搖原有的夥伴關係。

肆、結構與單元的互動

中共對於冷戰後世局的評估，不論是消極地適應或是積極的推動多極化的發展，事實上主觀的成份仍多，都僅止於主張的階段。冷戰後的國際

¹⁸ 沈驥如，中國不當「不先生」，頁 79。

¹⁹ 俞正梁等著，大國戰略研究，頁 338。

政治格局，比較接近事實的應是美國一超下的多極（uni-multipolar）²⁰局面。在此結構下，中共多極化的主張，當然要檢視體系內主要大國的態度。在中共與世界大國建立的夥伴關係中，只有與美、俄兩國具有「戰略」的名稱與意義。因此這兩國與中共的互動關係，正是結構論中結構與單元互動的重要一環。

一、中美建設性戰略夥伴關係

就短期成因而言，一九九六年三月台海危機瀕臨失控局面，促使美國重新檢討對中共的政策²¹，導致雙方從戰略高度思考彼此之間的關係。但是更基本的原因應是蘇聯瓦解、冷戰結束後，國際政治權力平衡產生的重大轉變。而其中最顯著的變化就是中共勢力的崛起，中共因為經濟持續成長，綜合國力增強，在國際政治的影響力與日俱增，²²勢必成為建構二十一世紀國際政治格局的主要力量。中美「建設性戰略夥伴關係」的建立，也就是為了因應此種權力重組的事實，以共同維持全球與區域的安全，但是雙方在台灣與人權等問題上仍有歧見，因此這一夥伴關係的發展，將視彼此的戰略需求與態度而定。

（一）形成背景

1. 美國

國際政治史上大國的興衰，往往會造成體系的變動，體系的主導者可能採取不同的政策，避免體系的變動影響到世局的和平與穩定。美國國內對於中共勢力的崛起，應當採取何種的對策，也引起激烈的辯論。部份人士主張對中共採取圍堵政策，他們認為中共經濟持續成長，民族主義抬頭，為了洗刷歷史的屈辱，以其興起中的強大經濟與軍事力量，必將成為美國在亞洲的敵人。因此必須在其崛起過程中予以有效的遏制。²³而另一

20 中共學者也有很多這樣的主張，如杜攻主編，*轉換中的世界格局*；沈驥如，*中國不當「不先生」*；俞正梁等著，*大國戰略研究*；另參見 Samuel P. Huntington, "The Lonely Superpower," *Foreign Affairs*, Vol. 78, No. 2 (March/April 1999), pp. 35-49.

21 見 Barton Gellman, "Reappraisal Led to New China Policy. Skeptics Abound, but U.S. 'Strategic Partnership' Yielding Results," *Washington Post*, June 22, 1998, second of two articles.

22 有關中共勢力崛起最全面的論述見閻學通等著，*中國崛起：國際環境評估*（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年）。

23 圍堵論者的觀點可參見 Charles Krauthammer, "Why We Must Contain China," *Time*, July 31, 1995, p. 72; "Partners in the Pacific," *The Washington Post*, April 26, 1996, p. A25; Gideon Rachman, "Containing China,"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Vol. 19, No. 1 (Winter 1996), pp. 129-139; Richard Bernstein and Ross Monro, "The Coming Conflict with America," *Foreign Affairs*, Vol. 76, No. 2 (March/April 1997), pp. 18-32.

派人視則認為必須擴大與中共接觸，以促成中共的改變。這一派人士雖然同意中共國力逐漸上升，影響與日俱增的事實，但是他們認為不能以對抗和壓制的手段，處理中共強大的事實，在國際權力平衡轉型期間，中共是敵是友，現在下結論為時尚早，斷然採取強硬對策，反而會弄假成真，使中共成為真正的敵人。因此只有加強與中共交往，將中共融入美國主導的國際體系中，賦予中共與其國力相當的地位，才能使中共成為國際政治、經濟與安全體系負責任的一員²⁴。簡言之，交往是戰術，融入才是戰略。目前柯林頓政府採取後一種政策，擴大與中共交往，將中共融入西方體系的運作機制，增加中共行為的透明化及可預測性，以「預防外交」的方式防範危機的發生。而事實上，無論是主張圍堵中共，或是積極與中共交往的人士，都認為美國仍應主導國際體系的建構，美國仍應是世界的領導。

2. 中共

中共更強調其勢力崛起，對世紀之交的國際政治的重大影響，中共首次真正體驗到有可能成為建構國際體系的力量，中共將以全世界最大的發展中國家進入二十一世紀，即將成為全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中共的崛起已經不再是主觀的願望，而是客觀的事實。在美、蘇兩大集團對峙的冷戰時期，中共外交政策的選擇，基本上仍然受到兩極體系的制約，即使在一九八二年中共提出「獨立自主」外交之後，也難完全如願。如今主觀的願望與客觀的事實將真正實現，最近中共與全世界各大國家或集團相繼建立不同形式的夥伴關係，目的就是要試圖建構二十一世紀的國際政治格局²⁵，其中最重要的一環就是與美國的「建設性戰略夥伴關係」。但是中共的大國外交格局一方面是要打破美國獨霸的天下，建立「多極化」的新局，一方面中共要以「一極」的身分出現，據此全面提高中共的國際地位。因此中共特別強調中美雙方要在相互尊重、平等與互利的基礎上發展關係，更希望作為超級大國的美國要克服處理國與國關係以及國際事務中的「主導」

24 接觸論的觀點請參見 Mortimer B. Zuckerman, "America's China Syndrome," *U. S. News & World Report*, October 30, 1995, p. 110; Kenneth Libenthal, "A New China Strategy," *Foreign Affairs*, Vol. 74, No. 6 (November/December 1995), pp. 35-49; Audrey Kurth Cronin and Patrick M. Cronin, "The Realistic Engagement of China,"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Vol. 19, No. 1 (Winter 1996), pp. 141-169; Henry Kissinger, "The Stakes with China," *The Washington Post*, March 31, 1996; David Shambaugh, "China's Military: Real or Paper Tiger?"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Vol. 19, No. 2 (Spring 1996), pp. 19-36; Robert Ross, "Beijing As a Conservative Power," *Foreign Affairs*, Vol. 76, No. 2 (March / April 1997), pp. 33-44.

25 「大國關係深刻調整、多極趨勢加速發展」，人民日報，1997年12月15日，版7。

意識，平等對待中共和其他國家，這樣才有利於國際社會的健康和穩定。

此外，中共一向認為我國長期抗拒與其談判，主要是因為美國對我的支持。雖然中共強調台灣問題純屬中國內政，不容他國干涉，但是中共仍希望美國能在台灣問題上扮演積極的角色，促使台灣走向與中共談判之路，建設性戰略夥伴關係的建立，更容易達成此項目標。

(二) 關係本質

在中共與美國宣佈致力於建立「建設性戰略夥伴關係」之時，雙方都沒有提出此種關係的具體內涵，美國國務院亞太事務副助理國務卿謝淑麗（Susan Shink）指出所謂「建設性的戰略夥伴關係」，實際上是指外交政策上的共同合作，而非一般所了解具有戰略意義的軍事結盟²⁶。中共副總理兼外長錢其琛也明白地表示：「美國方面主張提戰略性夥伴關係，我們提建設性夥伴關係，達成的協議就是建設性戰略夥伴關係。這個用詞裡面就是要建設這一夥伴關係，也就是不一定說現在已經是戰略夥伴關係，是向這個目標去努力。即使一個國家與另一個國家建立一種建設性夥伴關係，並不等於完全說他們就是好朋友，完全結盟沒有矛盾了。²⁷」以上的說法表示中共與美國雙方都認為有必要調整彼此的關係，但具體的合作與妥協則需更進一步的協商，因為中共與美國之間既有合作，也有分歧²⁸。

1. 共同戰略利益

美國總統柯林頓在江澤民訪問美國之前以及將訪中國大陸之時，曾經公開說明與中共交往的原因，柯林頓強調在全球和平、繁榮與穩定、亞太地區安全、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管制，全球經貿與投資自由化、共同打擊犯罪及毒品走私、環保等問題上，都必須要中共的合作，才能有效處理²⁹。因此中共與美國的夥伴關係是基於現實主義下權力平衡與國家利益的考量。從去年雙方宣佈建立此種夥伴關係之後，在安全方面的進展較為顯

26 聯合報，民國 86 年 11 月 9 日，版 9。

27 文匯報（香港），1997 年 10 月 31 日，版 A4。

28 討論這方面問題的著作可參見賈慶國編，棘手的合作：中美關係的現狀與前瞻（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1998），頁 293-299；蘇格，美國對華政策與台灣問題（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98），頁 755-763；王小東，「影響中美關係的中長期因素」，中國戰略與管理研究會國際形勢分析報告，1997-1998（北京：中國戰略管理研究會，1998），頁 10-17；趙春山「從中共的『矛盾論』看：華府與北京的『建設性戰略夥伴關係』」，理論與政策，第 12 卷，第 1 期，頁 1-11；楚樹龍，「中美合作與分歧」，現代國際關係，1998 年第 6 期，頁 2-6。

29 參見聯合報，民國 86 年 10 月 26 日，版 10；Newsweek, June 29, 1998, p. 18B.

和穩定。
國對我的
是中共仍
共談判之

雙方都
謝淑麗
外交政
共副總
我們
司裡面
是
伴關
上的
作與
28。

經
太
犯
。
考
願

著，中共已經承諾不出售核子技術給伊朗，雙方決定戰略核子武器互不瞄準對方，兩國軍方在人道主義救援和減災，軍事環境保護以及互派人員觀摩對方聯合訓練演習方面開展合作，達成協議。最後柯林頓與江澤民在高峰會之後，雙方並發表了關於「生物武器公約」議定書，殺傷人員地雷問題以及南亞核軍備競賽問題的聯合聲明，將來雙方在這方面的合作會更加強。在促進中國大陸市場自由化方面，雖無重大突破，但雙方經貿的往來仍會持續成長，彼此成爲重要的經貿夥伴。此種基於國際政治現實主義而建立的夥伴關係，是否持續永固或者存在者矛盾，則須進一步探討。

2. 價值與制度

基本上，中共與美國的「建設性戰略夥伴關係」存在著美國主導、中共爭取平等對待的矛盾關係。美國與日本之間也存在著此種矛盾關係，但是不會影響到兩國間的長遠戰略同盟關係。此外，大國的崛起，不一定會被體系的主導者認爲具有威脅性。美國對統一之後的德國的戒心較中共爲低，但是德國若統一在東德的制度之下，則情況就大不相同。因此兩國關係是否能持久穩固，制度的相容性是最根本與重要的因素。兩國政治制度不同，並不代表雙方不能合作，但是有其基本的限制與框架。美國在冷戰時期，花費鉅額軍費對共產主義進行圍堵，導致中央計畫經濟制度的破產，而美國下一世紀的目標，就是希望全世界主要國家的政治制度能與美國相同，如此最符合其國家利益。因此柯林頓總統在訪問中國大陸期間，隨時不忘宣揚人民的尊嚴與民主的價值，勢必對中共的領導階層與知識份子產生重大的衝擊。但是此種目標與民族主義高漲，勢力崛起的中共政權之間，也勢必會引起基本與長期的衝突。由此觀察，中共與美國之間的「建設性戰略夥伴關係」，可說是有「戰略」的利益，但是缺乏「夥伴」的基礎，而比起美國與日本、俄羅斯及西歐等強權的關係，顯然中美之間存在更多的戒心與疑慮，關係更爲疏遠。此外，中美雙方在台灣、西藏、人權問題之上仍然存在重大的歧異，造成中美關係「合而不固，鬥而不破」的格局。

二、中俄戰略協作夥伴關係

就國際政治權力分配角度分析，中俄關係在穩定中持續成長，由關係正常化逐漸提升至戰略協作，是對美國主導的全球戰略的回應。此種架構下的關係包括雙邊關係的積極推展，國際和平與發展以及亞太安全與合作的戰略協作，其實質內涵與運作成效，對於中共大國外交格局具有重大的

影響。

(一) 中俄關係的提昇—由關係正常化到戰略協作夥伴

一九九一年底蘇聯解體之後，中共與俄羅斯關係在原有的正常化基礎上持續發展，³⁰ 兩國領導人互訪頻繁，雙方至今共簽署了五個聯合聲明和一系列發展關係的原則和協定，其關係的發展由一般正常化到戰略協作夥伴的程度。

一九九一年年底，俄羅斯成立之初，中共認為蘇聯消失後，美國勢將獨霸，有礙於中共利益的發展，³¹ 因此中俄持續戰略和解，雙方將互蒙其利。一九九一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中共與俄羅斯簽署「會談紀要」，正式建立外交關係，並同意在和平共處五原則的基礎上，繼續積極發展關係。³² 一九九二年十二月俄羅斯總統葉爾欽首次訪問中國大陸，雙方簽署了「中俄相互關係基礎的聯合聲明」以及 24 項協議，為雙方未來關係確定了基本方向與原則。雙方相互視為友好國家，不參加任何針對對方的軍事政治同盟；不同第三國締結任何損害另一方國家主權和安全利益的條約或協定。³³ 雙方關係因此由正常化邁向睦鄰友好互利合作的程度。一九九三年俄羅斯部長級以上官員訪問中國大陸有 30 次，當年中共也有 15 個高級代表團訪問俄羅斯。

一九九四年九月江澤民應邀訪俄，這是中共國家領導人 37 年來第一次出訪俄羅斯，期間雙方簽署了進一步合作的「聯合聲明」，表示雙方已經具有新型的「建設性夥伴關係」，它是一種平權、沒有主、從之分的關係，既不結盟，也不針對第三國。為促進兩國國內改革和發展經濟的重大任務，以及在亞太地區和全世界建立持久和平提供有利條件。³⁴

一九九六年四月葉爾欽再度訪問北京，將雙方關係升格為「平等互信、面向二十一世紀的戰略協作夥伴關係」，並簽署 12 項合作文件。一九九七年四月，江澤民再訪俄羅斯，雙方發表了「關於世界多極化和建立國際新秩序的聯合聲明」，³⁵ 表達了對國際格局的看法，認為世界多極化

30 中俄關係的發展參見楊成緒，「世紀更迭與大國關係變化」，*國際問題研究*（北京），1999 年第 1 期，頁 6；開成章、何中順著，*時代特徵與中國對外政策*（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1998），頁 179-180。

31 *FBIS, DR/SOV*, December 17, 1991, p. 43.

32 人民日報，1991 年 12 月 31 日，版 6。

33 「中俄聯合聲明」，*聯合報*，民國 81 年 12 月 29 日，版 2。

34 人民日報（海外版），1994 年 9 月 5 日，版 3。

35 *聯合報*，民國 86 年 4 月 24 日，版 9。

趨勢在加速發展，和平與合作力量進一步增長，因此必須要建立公正合理的國際新秩序。一九九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江澤民再赴莫斯科訪問，雙方簽署「關於世紀之交中俄關係的聯合聲明」，除提出加強雙邊關係的九項原則外，並認為今後將加強彼此在重大國際問題上的協調，使雙方能為維護世界和平、促進國際合作與發展而共同努力。³⁶

(二) 關係的本質

中俄關係從正常化進展到戰略協作，對於國際政治權力結構的影響程度，必須從此關係的內涵，以及形成與制約因素加以分析，才能對其將來的發展有較客觀的評估。

1. 關係意涵

中俄之間的戰略協作概念，是由俄羅斯方面在一九九四年初率先提出的，中共當時採取審慎的態度並未積極回應，³⁷直至一九九六年四月葉爾欽訪問北京時，才同意將「戰略協作」的用詞納入聯合聲明中。其原因除了俄方的敦促之外，也由於美國在當年三月台海危機中的「霸權主義」表現，以及四月美國與日本重新確立並強化美日安保體制。即使如此，在聯合聲明中，對於「戰略協作」的內涵、政策目標和實際運作的表述，都趨於籠統和抽象，顯示此種關係仍有待建構，對第三者沒有立即的威脅。

一九九七年四月中俄高峰會，才對戰略協作夥伴關係的宗旨和政策目標作了明確的闡述，所謂戰略協作夥伴關係包括三個層次的合作：第一、深入發展雙邊合作，保持長久的睦鄰友好，促進兩國共同發展和繁榮；第二、在維護各自在國際上應有的地位和正當權益的基礎上，密切雙方在國際事務中的磋商與協調；第三、促進國際局勢的緩和與穩定，推動世界多極化趨勢的發展和公正合理的國際新秩序的建立。而在實際的運作上，則是首先通過加強聯合國的作用，推進國際政治的民主化和多極化；其次則是促進發展中國家更廣泛和深入地加入國際事務。³⁸從這些表述中可以看出，中共仍然以傳統的第三世界國家思維方式，區分世界的矛盾關係，並且利用在聯合國的優越地位，用以抗拒美國為主導的國際政治格局。

36 新華社，莫斯科 1998 年 11 月 23 日電。

37 參見畢英賢，「論中俄戰略協作夥伴關係」，問題與研究，第 35 卷第 12 期，民國 85 年 12 月，頁 21-23；鄭羽，「俄羅斯安全環境的新變化與中俄戰略協作夥伴關係」，國際形勢分析報告：1997-1998（北京：中國戰略與管理研究會，1998），頁 30。

38 聯合報，民國 86 年 4 月 24 日，版 9。

2. 發展趨勢

中俄雙方關係持續穩定成長，主要基於國內與國際環境的雙重需求。³⁹就國內層次而言，雙方都致力於國內問題的解決，因此需要睦鄰的友好關係，特別是因邊界友好，可以將節省的國防經費用於經濟建設。就中共而言，與俄羅斯的睦鄰關係可以使中共出口多元化，同時可獲得經濟發展所需的能源和技術。在俄羅斯方面，則可為轉型艱難的俄羅斯重工業和軍事工業的產品提供市場；同時通過中共可以和經濟充滿活力的亞太地區發展聯繫。

而國際政治的發展也促成了雙方關係的穩固與成長。第一、北約東擴的影響。俄羅斯發展與中共的關係，可以在某種程度上加強反對北約東擴中討價還價的地位。⁴⁰第二、美日聯盟加強的影響。對中共而言，美日防衛新指針的範圍，由過去的模糊地理概念到具體的周邊地區，性質由防禦性轉為先發制人的攻擊性，對中共造成潛在的威脅，中俄關係的加強顯然具有共同的戰略利益，以平衡美、日聯盟的發展⁴¹。第三、地緣政治因素。中俄在中亞地區具有防止伊斯蘭基本教義派擴展的基本利益。最後，西方對中共的制裁以及干涉中共內政上的台灣問題，也促使中共提升與俄羅斯的關係，從而在政治上加強自己，在軍事上通過引進俄羅斯的武器系統，來抵銷西方提升對台軍售質量所引起的兩岸軍力失衡。

當然，中俄戰略協作領域仍存在不穩定的因素，主要來自於國際政治權力的結構與雙方的外交定位。第一、在中、美、俄三角關係的結構中，中俄與美國都存在既矛盾又合作的關係，但是俄美與中美合作對俄中兩國都必不可少，因此中俄兩國在面臨與美國矛盾之時，中俄兩國的立場都受到本國與美國合作關係的約束，從而使得中俄兩國彼此支持的程度受到限制。其次，中俄兩國關係明顯存在經貿關係落後於政治關係、中央關係好於地方關係的特徵，出現「政治熱、經濟冷」，「中央熱、地方冷」的局面，⁴²雙方關係的基礎仍以戰略為主要考量，因此關係發展難以廣泛與深入。最後，中俄兩國在反對霸權、建立多極世界的理論上具有共識，但是

³⁹ 俞正梁等著，*大國戰略研究：未來世界的美、俄、日、歐盟和中國*（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1998），頁361-362；畢英賢，「論中俄戰略協作夥伴關係」，頁23-25。

⁴⁰ 高歌，「試談俄羅斯當前的大國外交」，*東歐中亞研究*（北京），1995年第3期，頁57-47。

⁴¹ Steven Mufson, "U.S.-Japan Accord Fans China's Fears," *Washington Post*, April 19, 1996, p. A28; Uli Schmetzer, "Russia, China find Common foe in U.S.," *Chicago Tribune*, April 26, 1996, p. 3.

⁴² 開成章、何中順著，*時代特徵與中國對外政策*，頁182。

在如何發揮大國作用方面，兩國在國際上卻有不同的定位。俄羅斯在成立之後，仍然延續重歐輕亞的思維，將加入七大工業國集會作為外交的主要目標，而中共則始終自認為是第三世界的一員，兩國對開發中國家的態度有很大的差距，對兩國欲以開發中國家為主，建構國際政治格局的企圖，產生重大的限制。

整體評估，促進中俄雙方改善關係的因素不會輕易發生變化，美國獨霸下的多極國際格局在短期內也不會消失，因此中俄雙邊關係將持續成長，但是在建構世界格局的努力上，將遭受嚴格的限制。

伍、結 論

中共一向重視對世界格局的評估，並作為制定外交政策的主要依據。冷戰時期，中共相繼以「兩個陣營」、「世界革命」、「三個世界」與「和平與發展」理論解析國際政治結構，並提出了向蘇聯「一邊倒」、「革命外交」、反蘇「統一戰線」與「獨立自主」的相應外交政策。⁴³冷戰結束後，中共經濟持續成長，軍事加速現代化，在國際上與各國建立不同形式的夥伴關係，企圖建構多極的世界格局，因此國際政治格局與中共外交政策存在密切的關係。中共雖將現實主義視為不講原則、惟利是圖的強權政治，⁴⁴但是結構現實主義的理論，對於中共大國外交格局的發展，卻具有較為客觀評估的能力。

在國際政治格局方面，中共與世界大國相繼建立不同形式的夥伴關係，並且與俄羅斯共同為建構多極化的世界而努力，認為多極化的世界格局有助於世界的和平與穩定。可是此種主張主觀成分居多，因為它缺乏對結構理論的探討，以及對中共國力的客觀評估。冷戰結束後，中共對世界形勢的評估是舊的格局已被打破，新的格局尚未形成的過渡時期。但是一九九一年波斯灣戰爭之後，美國獨強的局面隱然形成，一九九九年春天的科索沃危機，更加深了此種趨勢的發展。一九九九年三月底，在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成立屆滿 50 年之際，以美國為首的北約聯軍，以「人權高於主

⁴³ 參見韓念龍主編，*當代中國外交*（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8）。

⁴⁴ 從政治與道義方面批判西方國際關係理論，是中共國際關係學者的一項基本態度。如前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宦鄉曾謂：「資產階級的國際關係理論從所謂“現實主義”出發……從事鼓吹權力政治、勢力均衡、國家利益等等……總的來說，它是為維護帝國主義的對外政策的利益服務的。」參見宦鄉，「爭論中的國際關係理論中文譯序」，*世界知識*（北京），1988年，第8期，頁12。

權」為由，未經聯合國授權，對南斯拉夫聯盟共和國展開攻擊，此舉對冷戰後十年的國際政治格局產生重大的影響。⁴⁵ 第一、以美國與北約合作主導的國際政治格局逐漸形成，突顯了西方民主國家企圖拋開中共與第三世界國家，以主導國際體系的決心；第二、打破冷戰結束後意識型態與制度不再是國際政治爭執的迷思，西方價值觀將持續衝擊甚至改變國際關係準則，由此所產生的國際衝突將不可避免；第三、聯合國作為解決國際爭端的功能逐漸式微；美國與區域性強權的同盟關係將成為解決國際爭端的主要工具，中共利用在聯合國中的地位，影響世局的能力，將相對地降低。

在體系內單元能力方面，必須要客觀評估中國大陸的國力，才能瞭解它是否具有改變格局的能力。近幾年來中國大陸經濟發展快速，綜合國力也有相當的增強，這些都是不爭的事實。但是若誇大其成就，甚至預言二十一世紀是中國的世紀；或者提倡中國威脅論，這些都失之客觀。中國大陸國民生產總值雖然排名世界第 7 位，但是仍然低於人口不到 6,000 萬的英、法、意等國；若以人均總值計算，中國大陸排名更低，為世界第 81 位。最近聯合國發表的「人類發展指數」（按人口平均壽命、收入和教育程度編列）中國大陸在世界 174 個國家中排名第 106 位。⁴⁶ 此外，中共也堅持以開發中國家身分，申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顯然中共對自己的綜合國力仍不滿意。從以上的因素分析，中國大陸雖是政治大國，但是仍無法按照自己主觀願望改變國際政治的結構。當前國際政治格局應是美國一元下的日本、歐盟、俄羅斯與中共多極的局面，其中美、日、歐盟聯合牽制中共與俄羅斯的發展甚為明顯。中共大國外交的機遇與挑戰，就必須在此種國際政治結構下去尋求答案。

* * *

45 這方面的討論可參考王逸舟，「科索沃危機：『人權高於主權』的霸權主義」，*亞洲評論*（香港），1999 春夏號，總第 9 期，頁 143-152。王文客觀分析了國際政治格局的趨勢，但是主要在批判美國在科索沃事件中的霸權主義。

46 引自張睿壯，「中國應選擇什麼樣的外交哲學？」*戰略與管理*（北京），1999 年第 1 期，頁 66。